

鄂国由姁姓向姬姓转变及其迁徙的背景分析*

——兼论鄂国灭国后应属汉阳诸姬之一

黄凤春 王龙明

摘要:鄂国是一个古老的商周姁姓封国,随着禹鼎和近年来随州鄂侯器群的发现,其扑朔迷离的面纱才被逐一揭露,那就是在西周早期鄂国应是与曾国同时并列于汉东的一个古国,西周晚期因鄂侯联合南淮夷叛周室而被周王室所灭。通过南阳夏饒铺新发现的鄂侯青铜器铭文,证实春秋时的鄂国已转变为姬姓,说明鄂国灭亡后,同曾国一样,周人也应是在原姁姓之国的基础上重新分封了一个姬姓鄂国。重分封的鄂国可能也应属汉阳诸姬之一,只是在春秋初期因迫于楚国东进的势力,汉东姬姓鄂国才被迫迁往南阳。这对后世认识鄂国由姁姓向姬姓的转变及汉阳诸姬的史实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关键词:鄂国;禹鼎;姬姓;汉阳诸姬

中图分类号:K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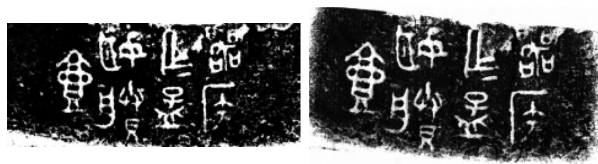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0)06-0091-06

商周时古鄂国的史料只散见于极少数的传世文献中,随着鄂侯驭方鼎和禹鼎铭文的发现,人们对其才略可窥其一斑。特别是在西周时期,鄂国一度与周王朝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乃至西周晚期,因其联合南淮夷叛周而被周王室所剪灭的史实已成定谳,但有关鄂国的方位一直是学界所未能确认的。直到2009年随州羊子山西周鄂侯墓地和2011年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早期曾侯墓地的相继发现,人们才确信,西周时期的鄂国与曾国是同时并存于随州的两个古国。

2012年在南阳夏饒铺再次发现了春秋鄂侯墓^[1],笔者曾怀疑原鄂国并没有被灭亡,而是将其余部迁到了今南阳夏饒铺一带^[2]。《江汉考古》2019年第4期全面报道了南阳夏饒铺这批

材料。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南阳夏饒铺一带的鄂侯虽然在年代上可与随州西周晚期的鄂国相衔接,但族群却已是姬姓了^①。如在夏饒铺M16和M19中都分别出有“鄂侯作孟姬媵壶”的铭文(图1)。由此可见,我们过去所作的推论并不完全正确,其间仍有很多内在背景问题尚需认真分析和探讨。



M16:3、4铭文

M19:10

图1 南阳夏饒铺出土姬姓铜器铭文

依据禹鼎铭文及周代封国的背景和惯例分析,我们认为,西周早期的鄂国应是被周人彻底

收稿日期:2020-06-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发掘报告”(14ZDB05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周代汉淮地区列国青铜器和历史、地理综合整理与研究”(15ZB03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周曾国墓地研究”(19BKG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凤春,男,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级研究馆员,武汉理工大学兼职教授(湖北武汉 430077),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王龙明,男,湖北省麻城市博物馆副馆长、馆员,主要从事商周学、考古学研究。

灭亡前,所分封的姁姓的鄂国,不存在将其余部迁到了南阳一带。而迁往南阳一带的鄂国正是周人在汉东重新分封的一个姬姓鄂国,原应属汉阳诸姬之一。将姬姓鄂国迁往南阳,应是周人对汉东政治格局的一次重大调整。

作出以上判定,主要是考古发现不断的证明:西周封国遗存绝大多数都显现出其国名与商代相比虽完全相同,但族名却已发生了根本改变。鄂国金文资料的发现以及体现在时空上的联系似也证实了以上问题,这为我们探讨鄂国由姁姓向姬姓转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一、从西周封国改姓不改国名的传统看鄂国由姁姓向姬姓的转变

西周王朝建立后,先后进行了多次分封,目的旨在“以藩屏周”。周人在灭掉旧有的殷商封国后,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区域一般是重新分封一个姬姓的侯国,但国名仍为旧国名,即改姓而不改国名。以汉东曾国为例,根据武丁时的卜辞,在汉东的商代一直存在着一个姁姓的曾国,随着曾侯乙墓发掘后,在还未见有西周早期姬姓曾国的遗物时,姬姓曾国为西周晚期被封于汉东已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共识。但2011年随州叶家山西周曾侯墓地的发掘以及大批金文的出土,才使学界确信,西周早期的曾国已经不是商代的姁姓曾国了。当然,西周封国改姓而不改国名的这一特性起初并不为学界所接受,在叶家山发掘之初,当发掘者已指出这个曾国应为姬姓时^[3],即有学者撰文反对,并称这个曾国并非姬姓,其应为商代姁姓曾国的遗裔国^[4],同时也有众多学者附同^②。

回顾曾国研究史,在曾侯乙墓发掘后的初始阶段,有些学者虽得出了姬姓曾国始封于西周早期^[5],但由于没有考古学实物的验证,曾国被封于西周晚期仍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甚至还有学者得出了曾国为土著姬姓的论断^[6]。我们之所以在讨论西周封国的族姓时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误入歧途,这说明,我们对西周封国的特性还缺乏相应的认知,总是将原有的封国同后来的同一封国混为一谈。

事实上,在汉东地区除了曾国外,还有一个

姬姓的唐国也是如此。唐国的始封年代史无明载,研究者大多据《国语·郑语》史伯说的一句话,即“当成周之时,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韦昭注:“应、蔡、随、唐,皆姬姓也。”认为唐国至迟在西周晚期已立国于江汉。但徐元诰在《国语集解》又说:“唐,南唐也,刘累之封,今湖北随县西北八十五里有唐县镇。”^{[7]461}徐氏所谓的“南唐”是相对于北方的唐国而言的,显然是指汉东的唐国。但说刘累之封,已早到了夏代,据“安州六器”之一的西周早期“中觶”铭文而知,西周早期姬姓的唐国已在汉水以东了。徐元诰所说的“刘累之封”应与姬姓唐国无涉。极有可能是将夏商时期的唐国和西周早期的唐国混为一谈了。

梳理相关出土文献,在商代的甲骨文中汉东确曾有一个唐国。如在甲骨文中就有记录,其卜辞为:

乙卯卜,争,王乍(作)邑,帝若,我从之唐。(《合集14200正》)

这是一则反映在唐作邑的卜辞,过去很少有学者论及。卜辞中的“我”,陈梦家先生认为不是“王”,也不是邦族名,应是卜人泛指商王国^{[8]318}。“我”作为商代的国名,见之于武丁时期的卜辞。其地应在南方的汉水以东一带。有关“我”国的卜辞有如下几则:

乙未(卜),口,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與(举),左从𠂔(曾)。(《合集》05504)。

乙未(卜),口,(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與(举),左从𠂔(曾)。十二月。(《合集》05504)。

上述二例卜辞是大家广为熟知的,是记录商人对南方征伐时利用了当地的方国,其中的“我”“與(举)”“𠂔(曾)”都是汉水以东的方国名。由这些卜辞对读,可确认《合集14200正》的一则卜辞中所记录的在唐作邑事例中所涉之“唐”应指的就是汉水以东的唐国。正是有“我”国的铭辞,才使我们确信在商代汉水以东就曾经有存在着一个唐国,但其族姓并不清楚,只能说明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除此之外,卜辞还见有商王对唐的征伐记录,如:

贞,于唐子伐(《合集》972)

贞,唐子伐(《合集》973)

上列是指商王对唐地的用兵,由此也可推知,周王夺得天下后,应是灭掉了原有的唐国,重新分封了一个姬姓的唐国。由叶家山西周曾侯墓发掘而知,周人灭殷后,也应同曾国一样,是在灭掉了原有的唐国后而重新分封姬姓的唐国。由于商周两朝在汉东都有相同的古国名的存在,学者在研究这些古老的方国时往往囿于文献,把前后二个国名相同,而族姓不同的国名混为一谈。如陈槃先生通过文献详细论述了唐国的爵称为侯,姓氏为祁姓,始封为尧后,建都于今湖广德安府随州西北八十公里的唐城镇,定公五年被楚所灭^{[9]769-774}。显然,陈氏所言汉东西周唐国为祁姓可能源于徐元诰的《国语集解》说,应是错误的。由甲骨文判定,汉东夏、商时期的唐国就有可能为祁姓了。

梳理相关考古发现,西周时无论是畿内还是畿外的封国的大多都是沿用了旧有的国名,如息、密须、纪等国也莫不如此。

息国也是一个古老的方国,其地约当在今河南息县。息国屡见于甲骨文,如

戊申帚息示二屯,永。(《合集》2354)
……子……何……息……白……。 (《合集》3449)

乙亥卜,息白弘,十一月。(《合集》20086)

王长丰先生认为:“《合集》2354 白辞为武丁时期卜辞,……‘帚’即妇,‘妇某’为商王请妇之专称,认为是武丁后妃之一;‘息’,方国族氏名。‘息’国某妇适于商王为妇,这也说明,息在商王武丁时期,曾为商王朝的姻邦。《合集》20086 辞之‘息白’,‘息’,侯国名,伯爵。由此可见,商代‘息’为侯国名。”^{[10]59-65}1979年至1980年在河南罗山后李发现了一批晚商墓葬并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很多青铜器上都有“息”字的铭文^[11]。因罗山县与息邻近,无疑,罗山出土的这批晚商青铜器应属商代的“息国”,应与姬姓无涉。到了西周时,息国已为姬姓了,说明应是周人灭殷后重新在旧有息国的基础之上重新分封的姬姓息国。

其实,周人改封其族姓在文献中也有明确的案例,如文献中的密须国即是如此。据《史记·周本纪》:“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

平。……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集解》引应劭曰:“密须氏,姁姓之国。”杜预注:“姁姓国,在安定阴密县也。”《诗经·大雅·皇矣》亦载有:“……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12]1030}《史记·周本纪》在周共王时提及密须国时有:“共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康公不献,一年,共王灭密。”《集解》引韦昭曰:“康公密国之君,姬姓也。”从文献记载看,在周文王、周共王时对密须国记载出现了同国不同姓的情况,《左传》一书则明确地作了解答。《左传》在僖公十七年曾有密须国的记载,杨伯峻注:“(密须)为文王所灭,以封姬姓。”^{[13]374}孔颖达《毛诗正义》中引皇甫谧云:“文王问太公曰:‘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须氏疑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主,伐之不义。’太公曰:‘臣闻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须。密人自缚其君而归文王。”这段话表明周文王讨伐密须只是因其反叛,改封其为姬姓国是为了“以藩屏周”。

西周纪国为姜姓,约受封于西周初年。其地约当在今山东省寿光县。“纪”在金文中多写作“己”。1983年在山东寿光益都侯城出土了一批商末青铜器,铭文多见有“己”和“己并”^[14]。说明在商代纪国就已经存在。西周的纪国应是在原有的纪国之上重新分封的。事实上,周人的这种改姓而不改名和重新分封还见于众多的封国,诸如鲁、燕等国也是如此,限于篇幅,我们不一一罗列。

正是依据这些众多的史料及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新认识,我们有理由推定当时鄂国因反叛姬周被灭后而重新封了一个姬姓的鄂国。尽管在禹鼎铭文中对灭鄂有“勿遗寿幼”一语,但从当时的南国形势而言,特别是面对强势的南淮夷而言,周人以姬姓的族人强化这一带力量以应对南淮夷不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没有南阳夏馆铺姬姓鄂侯铜器群的发现,我们还没有更有力的材料来作出这一推断。需要指出的是,周人的封国大多是在西周早期完成的,但鄂国的灭亡与重封已到了西周晚期,说明周人以姬姓封国应贯穿整个西周时期。

从相关封国及考古发掘新材料来看,有理由重新认识鄂国应是被周人灭国后,在原有余部的基础又重新分封了一个姬姓的鄂国,只不过其在汉东存续的时间不长,随着春秋初年楚国势力向东的挺进,姬姓的鄂国被迫迁往南阳,这就有了历史上的“西鄂”之称。其时空正好与南阳夏饒铺的鄂侯铜器群相印证。如果这一推断无误的话,那么,姬姓的鄂国原也应属传世文献上所载的汉阳诸姬之一。基于以上结论,下文就对“汉阳诸姬”一说进行必要的梳理。

二、由汉阳诸姬的考辨分析 姬姓鄂国迁移的背景

众所周知,汉阳诸姬是一个历史概念,首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大夫栾枝语“汉阳诸姬,楚实心之”。此前因囿于对“汉阳”区划范围认识的不同,再加上对汉阳区域内姬姓封国国名及数量认识的局限,古今学者都曾对“汉阳诸姬”一说存在着较大分歧。近来有学者对“汉阳诸姬”也持有怀疑,并进而认为是历史层累造成的产物^[15]。春秋姬姓鄂侯铜器群的发现将其初始定位于汉东,使得我们在这一区域新获得了一个姬姓封国的存在,同时对学界认识鄂国由姬姓向姬姓的转变及汉阳诸姬的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梳理“汉阳诸姬”,先要解决“汉阳”的区位问题。根据古人“山南水北曰阳”的惯例,汉阳无疑是指汉水之北而言。故而杜预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注中则言:“水北曰阳,姬姓之国在汉北者,楚尽灭之。”由于杜预并没有划定汉水以北的一个终止点,故而学者们对“汉阳”区划呈现出完全不一致的理解。其中清人易本焯在《春秋楚地答问》中试图明确这一个区域,他认为“汉阳”应是“西至汉水以东,南至汉水以北,东至光黄(潢),北至淮汝”^{[16]4}。今人杨伯峻也基本上是承袭了清人易本焯的观点,他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注中把位于淮汝的姬姓蔡国也纳入了汉阳诸姬中^{[13]501}。从地理方位而言,显然已超出了汉阳的空间范围,应不可信。

除了上述观点外,当今也有更多的学者将汉阳诸姬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化,并将其确定在

“终南山(秦岭)以南,淮水,汉水南北流域之区,大体相当于今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与中部、河南省南部”一带^[17]。也有观点认为“‘汉阳诸姬’,顾名思义当是指位于汉淮两岸的诸多姬姓封国”,范围包括了江汉平原、南阳盆地与淮汝地区^③。更有学者将“汉阳”和“汉阳诸姬”分别视为地理概念与政治概念,认为汉阳是指楚国的北部势力范围^{[18]190}。于薇则认为“汉阳”仅指汉水以东、以北的地区,而“汉阳诸姬”仅指分布在汉水之阳的姬姓诸侯国^[15]。

通过比较而论,笔者认为汉阳的指称不应无限度的扩大,更不应扩大至淮汝和江汉之地。相比较而言,于薇先生所作出的仅限汉水之阳的论断应更接近史实。特别是她从地理空间分布划分的角度对淮汉地区的自然地貌进行分析后,得出汉阳与淮阳是被桐柏山一大别山完整切割的两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空间,相互之间难以通行是有很强的说服力的,但她又得出,由于汉阳区划内很少见有众多的姬姓封国,进而否定“汉阳诸姬”的存在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其实,从“汉阳”广义的地理称谓而言,将其理解为汉水之北的空间是不错的,但从当时的语境分析实应作具体分析。笔者非常赞同于薇先生以地理的空间分布与自然地貌说法来理解这一称谓,即以这一区域的交通往来为依据。换言之,汉阳的空间位置是否有自然的山峦为阻隔,如果有,我们就应当予以充分考虑。实际上,在鄂北地区就有大别山和桐柏山,形成了山南和山北的不同地貌和生态环境,如果将这一山南与山北都视为汉阳显然就不合古人命名地名的习惯。以此为依据,将汉阳的地理空间无限度地扩大,是有问题的。故此,笔者认为,汉阳实应就是指南阳盆地、桐柏山一大别山以南,迤至黄陂、孝感即今汉水以东的这一片区域,即我们所说的随枣走廊一带。在地理空间上,虽说这一区域是汉水以东之地,但以汉水为地理坐标,仍属于水之阳的方位。故汉阳诸姬实际所指的就是这一片区域的姬姓封国,而不会是漫无边际的涉及淮水、汝水乃至江汉的广袤地区。

应该注意到,在传世文献中,除了“汉阳”的

地域称谓外,还有与之相等同的“汉东”和“汉川”地域指称。如《左传》桓公六年:“汉东之国随为大。”《左传》定公四年:“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笔者认为,传世文献中的所谓“汉阳”“汉东”“汉川”其实所指的都是同一区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南阳盆地、桐柏山—大别山以南,迤至黄陂、孝感即今汉水以东的这一片区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汉东”一词也新见于新出土的曾国金文中,2019年在随州义地岗发掘的曾公棼的编钟铭文中就有“皇且(祖)建于南土,敝(蔽)蔡南门,质(誓)应亳社,适于汉东”一语^[19],说明“汉东”的称谓由来已久。从曾侯卣铭文“敝(蔽)蔡南门”和“适于汉东”一语看,显然是把姬姓的蔡国排除在汉东之外的。据此可知“汉东”实际所指的就是现在所说的随枣走廊一带,编钟铭文也进一步证实了过去把位于河南上蔡西南的蔡国也纳入“汉阳”的地理格局内应是错误的。

如果说笔者所推定有汉阳之地仅限于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并迤至于黄陂一带的汉东之地不误的话,那么我们还应探讨在这一区域的姬姓封国问题。正是由于传世文献中有“汉阳诸姬”之说,那么在这一区域内究竟有哪些姬姓国家呢?由于传世文献的疏载,在这一区域里已很难再统计出几个姬姓国家来,以至于造成了两种局面,一是将汉阳的区域无限扩大,甚至将一些本不属于姬姓的国家也纳入其中;二是汉阳的范围虽接近于笔者所考论的范围,但这一区域又找不出多少姬姓封国来,进而否定了汉阳诸姬之说的存在。

笔者认为,汉阳诸姬应只局限于汉水中下游的汉东之地,其中很多的姬姓封国随着年代久远已无从可考,这些只能仰仗于考古发掘来破译。事实上,仅从传世文献中仍能确定一些,如比较明确的就有位于随州的唐和随(曾)、位于广水的贰、位于安陆的郢共四国。那么现在通过鄂侯铜器铭文的研究,又可进一步得出鄂国也曾一度属汉阳诸姬之一,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一带姬姓封国数量的认知。其实,这一带的姬姓封国还并不止这些,1977年10月至1978年元月考古工作者在黄陂鲁台山发掘了5座西周墓葬,其中以M30为最大,墓内出土青铜

器铭文有公太史的铭文^[20]。对于公太史所指,多数学者都认为是毕公^[21],目前尽管鲁台山的国别尚无定论,但姬姓周人的铜器出自于此地,至少这一带也应有姬姓封国存在的线索可寻。

就目前所罗列的姬姓封国而言,其数量并不偏少,特别是我们将鄂国也确定为曾属西周灭国后在此重封的姬姓国,对于确信有汉阳诸姬的存在增添了有力的证据。实际上,随着这一带考古工作的发现,可能还会有未曾掌握的姬姓封国面世。故此,汉阳作为周人经营的南方要冲,汉阳诸姬在此地应不容置疑。

需要指出的是,据传世文献所载,汉阳诸姬大多被楚国所灭,但据青铜器铭文所示,重封姬姓的鄂国先是处于汉阳的随州,而后被迁徙至南阳,并非为楚国所灭。笔者认为,鄂国之所以迁徙,可能与春秋初年楚国势力的东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从《左传》桓公六年所记楚国所言的“吾不得志于汉东”的局面是可相互印证的。姬姓鄂国迁出于汉阳后,虽说可能是迫于楚国东扩的势力,但其背景也可视作是周人为应对楚人在汉阳之地所作出的政治格局的一次重大调整,即以单一的随(曾)国来与楚人斡旋。

总之,近年来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随州羊子山鄂侯墓地以及南阳夏馆铺鄂侯铜器的发现,揭示出很多重大的学术问题。特别是姬姓鄂国铜器铭文的发现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汉阳区域的历史。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思考,提出了在别样视角下来重新解读“汉阳诸姬”这一特定的地域概念,祈望有识之士批评指正。

注释

- ①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馆铺鄂国墓地M19、M20发掘简报》;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馆铺鄂国墓地M7、M16发掘简报》;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馆铺鄂国墓地M1发掘简报》,以上均刊于《江汉考古》2019年第4期。②李伯谦:《西周早期的重大考古发现》,《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刘绪:《近年发现的重要两周墓葬述评》,收于《梁带村里的墓葬——一份公共考古学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笄浩波:《汉东的豳国、曾国和随国考》,收于《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董珊：《从出土文献谈曾分为三》，收于《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张昌平：《叶家山墓地相关问题研究》，收于《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版。曹芳芳：《两周时期曾国及族属考辨》，《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13年总59期。③赵燕姣：《西周王朝经营南国史实》，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参考文献

- [1]崔本信,王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南阳夏馆铺鄂国贵族墓地发掘成果[N].中国文物报,2013-01-04(08).
- [2]黄凤春.关于曾国的政治中心及其变迁问题[J].中原文化研究,2018(4):42-48.
- [3]黄凤春,陈树祥.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发掘获阶段性重大成果[N].中国文物报,2011-10-12(04).
- [4]杨升南.叶家山曾侯家族墓地曾国的族属[N].中国文物报,2011-11-02(03).
- [5]何浩.从曾器看随史[J].江汉考古,1988(3):52-55.
- [6]舒之梅,刘彬徽.论汉东曾国为土著姬姓随国[J].江汉论坛,1982(1):74-79.
- [7]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 [8]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9]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M].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10]王长丰.“息”方国族氏考[J].中原文物,2007(2):59-65.
- [11]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J].考古学报,1986(2):153-197.
- [12]孔颖达.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1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4]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县新发现一批纪国青铜器[J].文物,1985(3):1-11.
- [15]于薇.“汉阳诸姬”:基于地理学的证伪[J].历史地理,2010(1):231-243.
- [16]易本焯.春秋楚地答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7]杨东晨,杨建国.汉阳诸姬国史述考[J].学术月刊,1997(8):89-94.
- [18]吴三元.“汉阳诸姬”分封及地理考[M]//楚学论丛:第八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
- [19]凡国栋,等.曾公䷠编钟铭文初步释读[J].江汉考古,2020(1):3-30+2.
- [20]黄陂县文化馆,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J].江汉考古,1982(2):37-61+115-119+2.
- [21]刘启益.黄陂鲁台山M30与西周康王时期铜器墓[J].江汉考古,1984(1):50-60.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Change of Surname and Relocation of the State of E

Huang Fengchun and Wang Longming

Abstract: The State of E originated as a vassal of Shang and continued to exist as one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With the discoveries of the Yu bronze tripod and, more recently, the bronze assemblages of Marquis E, E's complicated history has become clearer to us. During the early Western Zhou, E was an archaic state that co-existed with the State of Zeng east of the Han River. It ended up being overthrown by Zhou military forces in the ninth century because of its rebellion with the confederation of Southern Huaiyi tribes against Zhou. New evidence of Marquis E-related bronze inscriptions from the Xiaxiangpu site in Nanyang reveals that by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ruler of E had already become surnamed Ji. The change of surname suggests that Zhou should have enfeoffed a new E state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archaic E polity. This new E state was likely one of those Various Ji-Surnamed Polities north of the Han River. Pressured by the aggressions of Chu, E was eventually forced to relocate itself to Nanyang Basi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se new discoveries provide important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trajectory of the State of E as well as the Various Ji-Surnamed Polities north of the Han river.

Key words: The State of E; Yu tripod; Ji-surnamed; Various Ji-Surnamed Polities north of the Han River

[责任编辑/云 扬]